

DIE GRUPPE

Al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Geschichte
schrieb

四七社

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

47

HELMUT BÖTTIGER

[德] 赫尔穆特·伯蒂格 - 著
张晏 马剑 - 译

一个传奇般的当代文学社团

——四七社的真实风景

东方出版中心

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保罗·策兰等数十位文学大家都在这里崛起
首部深度追索当代德国乃至欧洲文学摇篮四七社的权威之作
本书荣获莱比锡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DIE GRUPPE**47**Al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Geschichte schrieb

HELMUT BÖTTIGER

**四七社**

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

〔德〕赫尔穆特·伯蒂格－著

张晏 马剑－译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5-625号

Original title: DIE GRUPPE 47 by Helmut Böttiger

©2012 by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德)赫尔穆特·
伯蒂格著；张晏，马剑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7.5

ISBN 978-7-5473-1116-5

I. ①四… II. ①赫… ②张… ③马… III. ①47社
(德国)—史料 IV. ①I516.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747号

责任编辑：张芝佳

封面设计：今亮后声 田松

四七社

DIE GRUPPE 47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00毫米 1/16

印 张：29.25

字 数：386千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16-5

定 价：5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 52069798

目 录

引 言 位于市场、权力和媒体之间的文学 / 001

序 幕 巴恩瓦尔德湖的魔女 / 010

第 一 章 “我们期待,耶稣基督,在黑暗的岁月里。”

战后德国文学政治概况 / 018

第 二 章 “被世界历史唾弃。”

团体初期的混乱状况 / 033

第 三 章 军人阶层和香槟酒的紫铜味道

1947年11月海尔林根的第二次聚会 / 052

第 四 章 “你们醒来吧,你们的梦想很糟糕!”

作为四七社标志性人物的君特·艾希 / 067

第 五 章 锲而不舍的新手

里希特、安德施和媒体中的网络式联系 / 084

第 六 章 卡夫卡小姐

艾兴格尔、巴赫曼、策兰:一次无法预测的新的入门

经历 / 110

第 七 章 直来直去

《文学》的小插曲和流亡者的角色 / 144

第八章 “民众必须欣喜地投身于艺术!”

杂志《音调》和《文本与符号》以及重要的局外人沃尔夫冈·克彭和阿尔诺·施密特 / 158

第九章 节日必须到来

奇尔切奥海角的聚会和一次始料未及的新流亡运动 / 174

第十章 “你的腰间缠绕着青藤。”

从原始森林中走来：四七社庆祝成立十周年，进入新大陆 / 192

第十一章 伴随着牛铃铛和鹿角，战后时代走到了尽头

君特·格拉斯令四七社成为联邦德国文学界的核心机构 / 211

第十二章 巨大的棺材，巨大的矮人

吉泽拉·埃斯纳和克劳斯·罗勒的故事 / 229

第十三章 “他谈到你的时候就像在说一种新的疾病。”

文学评论的胜利 / 245

第十四章 从真实的袖子里钻出来

西柏林作为德国文学之都 / 258

第十五章 “秘密的帝国作家协会”

《明镜周刊》事件作为四七社的转折点 / 284

第十六章 兔子·刺猬·恩岑斯贝格

四七社“主导理论家”的道路 / 297

第十七章 “这闻起来像是名牌货。”

德国文学国家队做客瑞典的锡格蒂纳 / 312

第十八章 人生历程

1965年：在社会民主与饥饿的年轻作家之间 / 327

第十九章 失能的描述

通俗文学从四七社的精神中诞生：普林斯顿，1966 / 348

第二十章 历史的警棍

炮仗和普尔沃米勒：最后的日子 / 364

第二十一章 不合时宜的庞然大物

春天过后是寒冬：四七社也许会永存 / 384

致谢 / 401

注释 / 402

参考文献 / 425

四七社聚会列表 / 436

人名索引 / 438

译后记 / 457

引言

位于市场、权力和媒体之间的文学

一个幽灵在德国的文学发展中作祟——四七社的幽灵。尽管它已不复存在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它却依然在各种争论中神出鬼没——时而作为鬼怪，时而作为榜样，时而又作为鉴戒。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谣传和观点鲜明的结论得知它的意义的。此外，这个作家组织中的几个主角至今依然决定着关于文学的讨论，这个事实也对用何种方式谈论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君特·格拉斯、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马丁·瓦尔泽公开露面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时，就还总是会在媒体上产生最强烈的反响。他们是论争的高手，是讨论和一系列文章出现的导火索。他们可能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极端，但却始终仍然引人关注。尽管有些人回避他们，摆出拒绝或者轻视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名字却一如既往地成为商标。和后面几代作家中的大多数代表人物相比，即使已近耄耋之年，他们仍然能够做到处于中心地位。出现质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作家从四七社那里学到了形成其公共影响的机制。文学在那里变成了经营活动，在人们还没有形成对于雄辩术、现代交流手段和网络化联络的实践的概念之前，四七社的聚会已经是一种实际的操作。

初始的条件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一开始是一年两次，人们聚在一起待上三天，而这三天正是文学生活的催化剂。没有与之竞

10

争的任何活动,没有任何节日或者其他的大事——所有的一切都聚焦到了四七社每年的聚会上。因此,便可以更加准确地观察,文学发展在这里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活跃的,所有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是如何在这里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还包括了媒体化和商业化的各个方面。关于四七社有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一点都不足为奇。尤其是在其1967年解体后的20年里,它是一个被人广泛讨论的对象。它使得学术性的成果和普及型的作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团体对于联邦德国社会和文学生活的无法估量的意义被假定成了客观事实,人们近乎疯狂地以各种不同的独立视角对它进行剖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部全面描述这个团体及其历史的作品。虽然论战变得越来越尖锐,但是,除了海因茨·路德维希·阿诺尔德撰写的、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那部简明扼要的论著和他在哥廷根主持的更具学术性和系统性的《文本+批判》项目之外,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一种更大规模的将四七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的尝试。也许该由时间去利用这个历史的距离,将四七社描绘成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描绘成文学史上的一个篇章,而不是立刻陷入盲目的追随或者恶意的拒绝。长期以来,广播电台档案里保存的团体讨论的录音,还有与团体带头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通信的值得赞扬的编辑萨碧娜·科法拉于1997年发表的那些信件,都为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1

在此期间,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这个团体曾经发挥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如今尤其已与君特·格拉斯的人格、与他对自己所要求的那种道德审判合而为一。提到四七社,人们会自然联想到一些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社论一类的东西。然而,直到最后,在团体聚会的讨论中都只是具体地谈论被朗诵的文学作品。泛泛而谈或者甚至脱离文学内容的较为狭窄的范围都是一种禁忌。赫尔穆特·海森比特尔常常被引用的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声明看似主要是针对一种占据主导

地位的社会民主的道德：“假如人们尝试着中和‘四七社’作家们所有的文风，那么结果就会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风格。”¹

这主要是海森比特尔的一个狡猾的尝试，以便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团体对于他本人产生的作用上引开。因为自1955年起他一直都参加聚会，而且很早就被看作是这个团体的“吉祥物”——一位勇于作出尝试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诙谐和荒诞的效果。不久之后，海森比特尔便被视为现代的、将语言用作材料创作诗歌的知名作者，并且，他也明显地将这一点——就如他发表的见解所表达的那样——用作了高级的商标，但是，四七社却是他唯一可能参与的论坛。对于具有他这样的特点的人来说，没有另一个这样的舞台。约阿希姆·凯泽在他关于1964年在瑞典锡格蒂纳举行的、被普遍看作四七社对外影响达到顶峰的聚会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语句：“海森比特尔胜利地终结了锡格蒂纳聚会。”²这无论如何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虽然君特·格拉斯由于《铁皮鼓》所获得的意外成功成为这个团体最著名的作家，但是，他和尤其崇尚一种纪实性现实主义的团体的发起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不久之后，各种完全不同的“音域”都得到了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期，格拉斯、里希特和少数几个留下来围绕在首领身边的死忠就在审美方面陷入了守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是因为“吉祥物”海森比特尔，而且尤其是因为诸如彼得·魏斯、赖因哈德·莱陶、于尔根·贝克尔或者还有亚历山大·克鲁格这样的作家。克鲁格是1962年参与发表有关全新的德国电影的文件《奥伯豪森宣言》的作家之一，在同一年他还被里希特邀请参加团体在柏林的聚会，并且从这一时刻开始便成为聚会最独具风格的作家之一；除了他不同寻常的、打破常规的拼贴画般的文本之外，他还是文学与电影早期联系的代表。这里只会略微提及的还有以胡贝特·费希特、彼得·O.肖特耶

12 维奇或者彼得·汉特克为代表的最早的德语流行作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所引起的激烈讨论。

四七社始终都是矛盾而异类的。它远远超越了其召集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而在它所代表的文学立场方面,它又无论如何无法与他相提并论。自50年代中期之后,里希特本人在审美判断方面尽可能地保持克制,仅仅还发挥着组织者、接待者和讨论主持人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他有时也承认,对于那些首先确立了四七社文学意义的作品他并不是非常能够接受——那些与直接评价他的同龄人的世代更迭的经验和战争经历不再有关的作品。然而,关于真实过程的具体了解消失得越多,里希特和格拉斯就越发明显地处于评判的中心。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社会民主现实主义”的妙语,马丁·莫泽巴赫2011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使用了这个词。³这个词虽然非常尖刻,但却根本没有切中四七社50和60年代作为核心作品被加以讨论的文本的要害。四七社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联邦德国文学生活的出现,其原因也在于,在这里能够第一次听到一些重要而崭新的文学的声音。在聚会上展开的审美争论和在这个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各种见解,是联邦德国才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史见证。正如下面的章节所展示的那样,即使对像海米托·冯·多德雷尔、阿尔伯特·菲戈莱斯·特伦或者保罗·策兰这些后来常常在总体上被称为见证了四七社局限和短视的作家,评判的结果也一定大相径庭。

在此期间,保罗·策兰出席1952年春天在波罗的海边举行的聚会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神话。经常被人谈论的是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一次猛烈的攻击,并且很快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故事。

13 这个主题非常复杂。但是,这里应当指出,对于策兰来说,四七社无论如何不是他的主要问题。在后来的记述中被人们忽略的是,策兰曾经准确地记录下针对他的诗歌和他本人的富有侵略性的攻击从何

而来——来自那些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他们既像一个领导集团，同时又作为四七社最强劲的对手出现。这里，有两个名字需要特别提及——一个是君特·布勒克尔，在策兰与德国文学界的关系当中，他对1959年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的反犹太主义的严厉批评成为最重要的催化剂。⁴另一个则是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60年代，他充满了怨恨和带着一种对诗歌的狭隘理解发表了对于策兰的第二篇后果严重的批判文章。⁵

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过去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痕迹随处可见——无论人们怎样试图将这些痕迹消除。四七社的成员尽管大多数都错误地认为自己置身事外，却仍然深受影响。人们必须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作家群体的存在在当代历史方面的前提条件——他们经历了很多非常矛盾的过程。由于60年代四七社对于市场的统治地位，人们便忽视了它直到50年代中期依然默默无闻的事实。那时，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占据着上风——一种“高度文明”的形式，它将“德意志精神”当作一些始终完好无损之物加以崇拜，而在其中宗教的比喻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当时与此密切相关的作家有汉斯·卡罗萨、恩斯特·维歇特、维尔纳·贝根格林、斯特凡·安德烈斯或者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在所有的领域内，民族社会主义时期个体的延续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中。无论是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上至部长级人物和科学院的领导机构，公开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腔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是四七社在开创时期也充斥着那种被民族社会主义无孔不入地影响着的德语。在由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和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创办的、大致意味着四七社开端的杂志《呼声》中，人们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影响，而恰恰在阿尔弗雷德·安德施这个人身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各种不同的影响都得到了展现——他崇敬恩斯特·云格尔就像崇敬让-保罗·萨特或者威廉·福克纳以及

托马斯·沃尔夫风格的美国小说家一样。

然而,四七社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论坛之一——对于文学来说是唯一的论坛,它摆脱了官方对语言的控制和仇恨,把握住了民主社会的一些新的形式。只有在想象着那些框架条件时,人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在如何评价民族社会主义时期自身行为的过程中,区别最为明显。比如,弗兰克·蒂斯——当时一个推崇种族—民族主义的畅销书作家,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官员中的一个,就将自己描绘成了深受纳粹毒害的牺牲品,而作为从一开始就留在德国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君特·艾希则承认自己并不是反抗的战士。在四七社当中,人们还能够看到德国特有的精神创伤、意识形态和欲望的压抑。此外,那些倔强而又自命不凡的年长的“内心流亡者”和四七社那些年轻的士兵们还有一个棘手的共同点——一种对于那些在纳粹上台之前就逃往国外的流亡者的反感。然而,即使是在这一点上,四七社内部的发展也无法取得一致。比如,里希特就曾经邀请与自己有着共同审美倾向的瓦尔特·梅林无论如何要来参加一次团体的聚会——但是,恰好是那个血气方刚的、深受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感染的约阿希姆·凯泽,在团体讨论过程中激怒了流亡者梅林。里希特几乎是有计划地将那些流亡者排除在年轻的、还默默无闻的四七社的自我发现之外,这一方面是因为代沟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于作家角色的不同的定义。汉斯·维尔纳·里希特与著名的、在媒体中联络广泛的赫尔曼·凯斯滕关系的发展就极具代表性。需要认真看待的是里希特本人在30年代中期在巴黎将近一年的流亡生活的经历——民主和左翼力量的自相残杀、流亡者们内部的争斗都令他感到恐惧;对于魏玛共和国结束时开展论战的习惯,他有一种反对的冲动。

四七社为什么局限于纯粹文学的讨论,它的主要动机也就在于此。但是,恰恰是它看似荒谬的社会政治功能却又显而易见地扩大

了它的影响。如今回想起来,它在1967年似乎就已经过时了,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时刻,四七社已实现了它的目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始终令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对于文学市场形成的参与。这是里希特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准确把握的一个视角,尽管作为非常有才干的组织者和谋略家,他已经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并且从很早就开始建立起网状的联络体系。然而,以1958年格拉斯《铁皮鼓》的问世作为充满激情的开端的四七社的文学政治成就却硬生生地从里希特身上碾压了过去——在那之前不久,他还想过从文学的舞台上隐退并且只投身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比如议会外的反对派和“反对核武器致死的斗争”。然而此后,作为老练的活跃分子,他便马上认识到了一些机会的出现,这些机会都是四七社广泛开展的对于联邦德国的各种辩论和他作为信息传播者的与日俱增的影响造成的。

从起初在内部进行的工作坊讨论发展而来的对联邦德国文学发展的臆造首先就是从四七社流传出来的东西。这里,文学和媒体被彼此联系了起来,这里,成功与失败、公共反响的机制都得到了发展。因此,能够成为四七社个体化象征的与其说是君特·格拉斯,毋宁说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假如没有四七社这个舞台,恩岑斯贝格就不可能如此高超地掌握其独特的驾驭媒体的技能。早在25岁时他就加入了这个团体,在这里,他能够直接施展很早就被他在理论上认定的当代作家最重要的才能——与公众的相互联系。他设置

利用媒体，“参与到它们危险的游戏之中”，⁶将它们在作者的意义上工具化。于是，恩岑斯贝格便成为今天文化记者这一角色的榜样。几十年中，他总是能作为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物，时至今日，他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一个制造喧哗的头领。他是四七社在文学政治方面的最好的学生。

在四七社及其周围环境里，人们第一次体会到，文学的聚会也能够成为“重要的事件”。瓦尔特·赫勒雷尔1960年之后在西柏林举办的系列朗诵会——其中就有在议会大厅举行的——气势咄咄逼人，带给文学的介绍与接受一个新的维度——电视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新的展示方式在这里得到了试验，作家们在这里允许主持人公开地提问——这些都是在当时还非常不同寻常、需要慢慢适应的事情。文学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事先无法预见的繁荣时期。

下文就将描述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四七社解体之后，尤其是在70和80年代，在文艺副刊上一再出现一种仪式，也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再次需要一个四七社？这个组织的解体在文学发展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一种引人注意的“幻肢痛”一直存在，这样的讨论每隔几年就会重复一次，常常是出现一篇赞成和一篇反对的文章作为今天争论文章的开路先锋。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在克拉根福策划的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竞赛显然是有意在延续四七社的传统，而君特·格拉斯以工作坊朗诵和讨论的形式组织了由他设立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则完全模仿了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995年，他还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德语文学的五十五份问卷》的集子，其中对当代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四七社’吗？”⁷几乎在同一时间，作家赫尔曼·金德发表了一篇论战文章，在其中将四七社描写成了文学发展的领头人生硬地压制后辈作家的典型事例——即使在其“寿终正寝”之后很久，看似依然存在。⁸

然而,本书却无须再参与任何一场关于四七社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讨论。它拉开显而易见的距离来描述四七社——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现象,连同它所有重要的、某些自相矛盾的结果。当然,这个现象与时代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无论如何不会直接与今天的文学实践有关。但是,某种反响现在却仍然偶尔存在。比如,在2011年的一个讨论1963年四七社聚会的影片节选的电视节目中,当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西比勒·勒维查罗夫就断言:当时,这些作家们“真的确信,文字是有影响力的,确信无论如何有类似于写作的道德背景原则一类的东西存在”。“时代已然向前。对此,人们也可能会感到遗憾。作为作家,凭借写作进入那些极其多样的不同体系中并不美妙。假如我可以选择的话,坦白讲,我更希望在旁观望……”⁹

今天,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四七社的问题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出来了。但是,有时候这个问题却又出人意料地再次出现,就像一个幽灵,被神话承载,被猛烈地攻击或者被怀旧地神化。在这一点上,再一次更加准确地观望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再次探究这个对联邦德国文学史产生过如此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团体存在的意义。

巴恩瓦尔德湖的魔女

当年四七社建立的地点现在是一个宿营地。12位不知名的作家于1947年9月费了很大力气来到了伊尔莎·施耐德-凌耶尔的住所，在信件的题头上，这幢房子使用了“巴恩瓦尔德湖庄园”的名称，这是一座低矮的、近乎三层的建筑，屋檐下面的墙壁已经倾斜。今天，那里居住着在巴恩瓦尔德湖畔为宿营者提供补给的报刊亭的女老板，房子周围小心翼翼地围起了一圈木栅栏。然而当年，这幢房子却一定给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它孤零零地矗立在湖边，像一座别墅，女主人也是独自一人居住在这里。许多年之后，她仍作为“巴恩瓦尔德湖的魔女”鬼魅般成为附近施万高周围村落里人们的谈资——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奇特的女士，她看起来总是以某种方式从事着艺术工作，和当地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即使是关于她的生辰也是众说纷纭——1910年还是1903年？——但是，这位身材高大的女士却在1947年明显地焕发了青春，导致人们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防御机制”。她长发飘飘地骑着一辆摩托车兜风；将手指甲染成红色；她身穿各种相当醒目的裙装和长长的裤子，搭配很多引人注目的装饰，这在那个年代和在那个地区对于一位女士来说还都是极其不得体的。而人们在酒馆的谈话中必然会提到的她与男人们的故事又自然而然地提升了她自身的魅力。

1947年7月,在上巴伐利亚阿尔滕伯尔因一处贵族后裔的住所举行的一次作家聚会上,伊尔莎·施耐德-凌耶尔遇到了并不十分喜欢这次活动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他认为,人们必须把这样的
 一个活动搞得与众不同,更有朝气,更有批判性。在他看来,问题
 仅仅在于举办的地点——在战后德国被占领的时期很多事情都是临
 时抱佛脚。而对于伊尔莎·施耐德-凌耶尔来说,这次聚会能够在那
 19 那里举行根本不是问题——她拥有湖畔的这栋房子连同地产,而且
 她还拥有捕鱼的权利,这对于膳食供给来说会是极其必要的。1945
 年,她的父亲,一位巴伐利亚的主任林务官去世。她继承了所有遗
 产,搬迁到了菲森附近的巴恩瓦尔德湖边——在从事了几年人种学
 和艺术研究之后。在少数对这位女士的回忆中一再出现的“另类”
 这个词也与她的身世有关——在民族社会主义者“攫取政权”之后,
 她从柏林逃往法国,在那里,她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圈子里活动。

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在柏林莱特俱乐部的摄影学校里接受了
 她的第一次艺术培训。¹在那里,她展现出对于艺术品,尤其是雕塑
 摄影的浓厚兴趣。同时,她还学习了艺术史和人类学,与包豪斯的重
 要人物建立起联系,结识了匈牙利犹太建筑师和画家拉斯齐洛·凌
 20 耶尔并嫁给了他。在巴黎流亡期间,她作为摄影师为一些杂志工作,
 也出版了一些艺术影集——比如关于宗教崇拜的面具,关于希腊的
 赤陶或者米开朗琪罗、多那太罗和罗丹。在法国被占领后,巴黎的
 艺术活动环境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伊尔莎·施耐德-凌耶尔越
 来越频繁地前往父母亲居住的巴恩瓦尔德湖,并且最终与她的丈夫
 分道扬镳。一则谣言说,他甚至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女人。

在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遗物中可以找到她主要的艺术作品
 之一——1934年皮珀出版社出版的《面具的世界》——一幅关于人的
 陌生化和伪装程序的内容广泛的全景画,涵盖各个大洲,其生命力
 尤其在于许多令人感到惊讶的图片。给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献